

道德心理与道德教育研究述评

刘乔羽

聊城大学 山东 聊城 252000

摘要:道德问题一直是哲学,心理学和教育学讨论研究的核心问题之一,尤其是近几年社会上出现层出不穷的青少年道德问题,给家庭教育和学校教育带来巨大挑战。随着新时代人工智能的发展,也带来了新领域的道德问题:网络道德问题,因此人们如何正确认识道德心理至关重要。本文基于以往研究梳理道德心理与道德教育的成果,总结有关道德认知、道德情感、道德行为、道德与非道德领域的研究与道德教育的研究新进展,探讨了道德心理与道德教育的研究发展。

关键词:道德判断,集体道德情绪,网络攻击行为,道德教育

一、道德心理的相关研究概述

道德心理往往是由道德认知、道德情感和道德行为三方面组成的一种稳固的心理特质,通过个体自身所持有的道德行为准则行动时产生和表现出来。

(一) 道德认知

道德认知研究主要集中在道德判断和有关道德两难困境的范式^[1]。道德判断能力是指个体对哪些是道德的决策和判断能力,一般通过道德判断测验的方法测得。道德认知研究的经典范式是道德两难困境范式,它由皮亚杰对偶故事和科尔伯格两难故事法发展而来。最早提出道德两难问题的是哲学家 Foot,他提出经典的电车难题:一列奔驰的列车将撞死 5 名铁路工人,可以挪动轨道让列车转向,但这样列车会撞死另一条轨道上的一名工人,面对这样的情况你是否会挪动轨道?电车难题的另一个经典变式是天桥难题:在把一个人推下天桥就可以挽救另外五个人的条件下,你是否会推下前一个人?根据以上两个问题研究发现道德两难困境普遍有功利取向和道义取向两种取向。

功利取向者往往在做出判断时认知推理占主导,遵循利益最大化原则;道义取向者做出道德判断时情绪直觉占主导,符合道德准则。Greene 等人将道德两难困境的典型分为两种,非自我道德两难困境和自我道德两难困境,前者的被试更倾向于认知推理主导,做出功利主义判断(如电车难题);后者的被试由于情绪直觉的主导更容易做出道义取向判断(如天桥难题),二者的实质性区别是后者对别人的伤害行为是被试亲手造成的。另一种将道德两难困境分为高冲突道德两难困境和低冲突道德两难困境,前者个体反应时间快,后者个体反应时间慢。

影响道德两难困境的个体差异主要包括性别、人格特质、情绪状态。通常认为性别因素中女性的共情水平高于男性。以往研究中发现,女性更具有理解他人情绪状态的倾向因而容易做出道义主义判断。有关人格特质因素的研究表明一些反社会人格特质可以预测道德两难困境中的功利判断。在道德两难困境中,高精神质的个体对伤害行为的厌恶水平

低于正常个体,因此推测他们更愿意为了利益而采取伤害行为为并更偏向功利主义。在道德两难困境上的选择另一个因素是依恋,研究表明不安全依恋的个体更多做出功利主义判断,他们对加害行为关注较少,对受害者具有较低的共情水平。情绪状态因素中,高尚的积极情绪更容易引导个体的道义主义倾向,因为这些积极因素包含着榜样的积极引导作用,教导个体遵守道德规范,避免伤害行为。

除此之外,认知负荷、文化差异也会影响道德两难问题的判断,认知负荷与道德判断负相关,文化差异中研究结果表明,外语效应能够增强个体的理性推理,而宗教能减少不道德行为。最近研究发现,性别歧视的概念广度显著地预测了受害者和施暴者的道德判断,这种语义扩展反映了社会对伤害日益敏感,并且导致明显的道德判断差异。研究认为女性和政治自由者往往对性别歧视有更广泛的概念,拥有广泛概念者认为女性在道德上更有耐心更容易受影响;而男性在道德上更具有能动性(如:在道德上负责任),应该受到更严厉的惩罚。

人们是否认为自己比他人更有道义?早先研究发现人们认为自己比同龄人更无私、善良和慷慨,参与者始终认为他们会比其他人表现得更道德。以往道德判断研究表明,做出道义判断的人被认为更有道德,更值得信赖,而做出功利主义判断的人被视为缺乏同理心和道德行为。自我道德判断的差异可能作为一种保护机制,了解自我和他人在道德判断上的差异有助于更好地消解人们合作的障碍。

(二) 道德情感

道德情感不同于基本情绪,这种与群体和个人利益紧密相连的情感决定了个体的道德行为。这种情绪针对自己的行为而产生内疚,若是针对集体中他人的行为而产生集体羞愧。研究者们常将内疚、羞愧、移情等归类为道德情绪。根据 Haidt 的道德情绪分类,将它们分为以下四种:谴责别人的情绪(蔑视);自我意识情绪(羞愧);对他人的不幸产生的情绪(移情);与赞赏他人相关的情绪(感激)。体验到道德情绪非常重要,它能够使人们遵守社会准则、促进社会问题

的解决^[2]。

以往大多数研究仅仅关注个体,近几年开始也较多关注集体情绪(如:集体羞愧、集体原谅)。集体羞愧可能产生于个体察觉到自己所属的群体已经对另一群体做出了伤害行为。当个体对群体有较高的认同,群体成员意识到自我应当对所在群体的加害行为或所造成的负面影响承担必要责任时,就会产生集体内疚。若被试体验到集体内疚,会更倾向于对受害的外群体做出补偿行为,而补偿行为的关键是移情,被试对受害群体做出补偿行为的可能性随移情水平的提高而提高。集体羞愧是由于内群体软弱无能或者违背道德规范或准则被公开曝光时产生的,但它并不会像集体内疚一样引发补偿行为,由于内群体形象的受到威胁,群体成员体验到群体羞愧后,更容易造成对外群体的各种回避和敌视行为。

最近有关道德心理的研究还关注于道德传染。由于情绪是能够传染,而关于道德品质的道德情感也能够传染,道德情感的表达是道德和政治思想在在线社交网络中传播的关键。通过对三个极化的道德问题的社交媒体交流进行大样本研究,研究发现每增加一个道德情感词汇,信息的传播率就会增加 20%。研究结果强调了情感在道德观念的社会传播中的重要性,也强调了社会网络方法在道德研究中的效用,为人们如何通过社交网络接触到道德和政治观点提供了见解,由于人们越来越沉浸在社交网络中,从而扩大了社会影响和群体极化的模式。道德传染中,负性道德品质的传染过程又被称为不道德传染,不道德行为或事件引起的情绪与常规行为事件所引起的情绪有明显差异,不道德传染对情绪的影响是持久而深入的,比如人们对邪恶之人所穿过的衣服表现出厌恶,即便该衣服已被清洗过,这种情绪依然能够维持很长一段时间存在困扰着人们的。让被试想象使用道德违法者的餐具,随后的情绪评定结果表明,不论道德违法程度如何,被试均产生了显著的愤怒情绪。它有两种传染途径,一方面通过道德不良者作为传染源将负性道德品质直接传递给他人,另一方面也可以通过传递给道德中性物品,再由此物品传递给受传染的他人,研究发现这些做法能够引起被试情绪、认知、生理等方面产生明显变化。

(三) 道德行为

道德行为的研究最早是班杜拉在社会学习理论中提出,早期的道德行为研究更加关注环境,社会文化关系、榜样和强化等道德行为形成的关键因素。

青少年早期是欺负行为发展的高峰期,在总体样本为 33 万人关于传统欺负行为(包括身体、言语和关系欺负行为)和网络欺负行为发生率的研究中,前者的平均发生率为 35%,后者网络欺负行为的发生率为 15%。欺负行为属于特殊攻击行为的一种,是亚型道德推脱。欺负者通过对受害者身体言语或人际关系等多方面蓄意伤害的方式实施加害并且受害者力图躲避的行为称为欺负行为。一般个体在解决冲

突问题时,将攻击行为视作解决问题的手段,并认为采取攻击性手段是合理的,是会得到大多数人认可,这样的信念被称为攻击行为规范信念。个体对自我保护的认知倾向被称为道德推脱,它往往为了避免内心的道德谴责和逃避责任而使个体在做出不道德的行为时,用一定方式合理解释自己的行为。研究表明在攻击行为规范信念对青少年欺负行为的影响中,道德推脱是其中介因素^[2],这意味着在攻击行为规范信念会增加大学生网络欺负行为,对于攻击行为规范信念较高的大学生来说,其出现网络欺负的可能性更大^[4]。道德推脱会降低个体不道德行为的罪恶感,让个体更容易承认不道德行为,而个体网络欺负行为的合理化会降低个体的网络道德水平。

暴力环境的接触频率越高,大学生越有可能进行网络攻击行为。最近研究发现反刍思维在暴力环境对大学生网络攻击行为的影响中起中介作用,网络道德在暴力环境暴露对大学生网络攻击行为的影响中起显著调节作用。这体现在个体会反复思考事件的原因和后果,而不是积极思考如何解决实际问题。将大学生置于暴力环境中后,他们会在脑海中反复考虑这些负性的刺激,这会导致他们的注意力狭窄,认知能力减弱。反刍思维对大学生有一定的心理伤害,它可能会导致大学生部分的社会功能和人际功能受损,与正常个体相比,他们可能对他人怀有敌意,并存在认知偏差,从而增加他们的敌意水平和攻击性水平,加上网络的匿名性和世界的便利性,他们将无法在现实生活中肆意发泄的负面情绪发泄在网络环境中,更可能对他人进行网络攻击^[5]。

二、道德心理在非道德领域的发展

主要是指不道德传染在非道德领域的影响,包括具身认知,经济心理和人际互动过程三个方面。具身认知体现在身体清洁、厌恶,身体温度及身体动作等方面^[6],个人道德纯洁受到破坏之后会产生清洁身体的需要,即“麦克白”效应(Macbeth effect)^[7]。

第二个方面是经济心理—金钱支配,一般来说,人们会贬低那些与他们所厌恶的传染源有过接触的物品的价值,而且人们与该物品的接触越直接亲密,对该物品的贬低程度越大。与其他物品不同,人们对金钱的态度会随金钱数额的变化而变化。已有研究对受到不道德传染后的他人行为进行不道德程度评定的,结果发现,被试更可能在违反道德者以欺骗手段获得金钱且涉及的金钱数目较少的时候对道德违反者进行指责。

人际互动中表现为群体情绪行为、组织管理和亲密关系中的忠诚与纯净。一般情况下,腐败个人或组织的不道德行为会使人们表现出强烈的厌恶并且他们都尽可能使自己规避被传染的风险,但是一旦在个体道德自我形象得到保证以后,腐败可耻的观念可能会受到影响并随之发生改变,一旦他置身于周围的人都是腐败份子的环境下,他们可能会认为腐败是实现个体乃至群体目的主要手段,不道德传染产生

的效果就致使被传染的个体也更有可能会出现不道德行为[8]。但亲密关系间的不道德传染及道德判断不一定遵循一般的模式,维护亲密关系的动机会超越对道德违法者不纯净及伤害性行为的消极感受,甚至道德判断还会显示出积极的趋势。

三、道德教育

重视道德教育,是我国教育的一个优良传统。中华民族悠久历史文化中孕育着许多优秀杰出的人物,他们是我国儿童青少年良好品德发展的正面榜样。然而,随着现代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等各方面的变化,国内外教育观念的相互交流融合,我国青少年品德教育的价值观念正面临着新旧文化的挑战,道德教育的现状也出现了一些与传统观念相矛盾的困境。一方面,大多数学校的道德教育更多地是灌输式教育,儿童与青少年在真正面对道德冲突和解决问题时,却很难进行迁移应用、作出正确的道德判断,如果能够重视并解决这些矛盾,正确看待传统道德教育,对儿童青少年的成长发展也至关重要。另一方面,在现实社会中存在很多道德冲突,有些冲突是明显激烈的冲突,有些冲突是潜在的,提倡道德认知发展的心理学家应当更为关注如何使儿童在面对冲突时做出正确的道德判断和推理,并合理地解决这些冲突[9]。

林德提出,对个体道德的描述必须包含情感和认知两方面,也就是说,如果某种行为被认为是道德的,那么个体不仅要有自己认可的道德观念和道德原则,还要能够将这些观念和道德原则贯彻到自己的行为中去。直接的道德观念教育或灌输有利于改变儿童的道德态度,但不能促进道德能力的发展。教学生一些处理问题的方法可以更好地促进他们道德能力的发展。注重结合现有研究,才能提出更有效的家庭和学校教育对策。

四、道德心理与道德教育研究展望

最后,根据前人研究和发展提出道德心理与道德教育领域的研究展望如下:

(1) 道德心理和道德教育的相关研究受社会文化背景较多,因此跨文化研究和希望已有研究结论的中国化,重复性验证方面变得尤为重要^[10]。

(2) 新技术为道德心理和道德教育带来新的挑战,在

当下社会中,互联网的道德心理相关研究与传统道德心理研究结果有何区别,以及在网络环境下如何正确引导道德舆论,对不同年龄群体进行道德教育也需要引起重视。

(3) 目前道德心理集中在青少年和成人,而在道德发展的最初期儿童阶段研究较少,道德教育和道德判断能力的培养能否在道德发展的初期进行控制,仍是当代心理学在道德心理与道德教育领域应当突破的部分。

参考文献

- [1] 徐同洁,刘燕君,胡平,&彭申立.(2018).道德两难困境范式在心理学研究中的使用:回顾与展望,中国临床心理学杂志,26(3),458-463.
 - [2] 刘晓洁,李丹.(2011).集体道德情绪研究述评.心理科学,34(2),393-397.
 - [3] 孙晓娟,李梅,赵悦彤,张向葵,邓小平,&曲普.(2019).攻击行为规范信念对初中生欺负行为的影响:道德推脱的中介作用.中国临床心理学杂志,27(6),1246-1251.
 - [4] 郑清,叶宝娟,姚媛梅,陈佳雯,符皓皓,雷希,&游雅媛.(2017).攻击行为规范信念对大学生网络欺负的影响:道德推脱与网络道德的中介作用.中国临床心理学杂志,25(4),727-731.
 - [5] 金童林,陆桂芝,张璐,乌云特娜,&金祥忠.(2018).暴力环境接触对大学生网络攻击行为的影响:反刍思维与网络道德的作用.心理学报,50(9),1051-1060.
 - [6] 叶红燕,张风华.(2015).从具身视角看道德判断.心理科学进展,23(8),1480-1488.
 - [7] 丁凤琴,王冬霞.(2019).道德概念具身隐喻及其影响因素:来自元分析的证据.心理科学进展,27(9),1540-1555.
 - [8] 王悦,龚园超,&李莹.(2019).不道德传染的心理机制及其影响.心理科学进展,27(4),700-710.
 - [9] 杨韶刚,吴慧红.(2006).青少年道德判断能力的研究.心理学探新,98(26),55-61.
 - [10] 吴言动,王非,&彭凯平.(2019).东西方文化的人性观差异及其对道德认知的影响.心理学探新,39(1),34-39.
- 作者简介:刘乔羽(1997—),女,汉族,山东省济南市,学生,硕士在读,聊城大学,人才测评与人力资源管理方向